

阎锡山和“九·一八”事变

赵承绶

阎锡山留学日本时，正值明治维新末期，他十分羡慕日本的军国主义政策，就竭力结交冈村宁次、板垣征四郎、土肥原等军国主义分子。那时，日本帝国主义早有侵略我国的野心，正在有意识地培养汉奸“种子”，阎锡山这个自私自利，爱财如命的人，自然成为意中的对象，便多方培养，灌输亲日思想。阎锡山更是想效法日本军国主义做法，企图回国后达到他统治人民的欲望。两相需要，自然就会紧密勾结。罪恶之根从此种下了。

1930年，蒋介石、阎锡山在中原进行了一场大混战，结果阎锡山战败，不得不被迫离开山西，逃居大连。阎锡山选择大连这个地方，有他的用意，一方面仍然可以就近秘密控制山西；另一方面可以进一步和他的日本主子勾结，主要是想凭借日本力量，图谋东山再起。在大连期间，经常由其亲信靳祥垣、宋澈、李庆芳等极端亲日分子，不断和日本帝国主义秘密勾结，干出出卖国家民族的罪恶勾当。

1931年，我仍然充当山西军队的骑兵司令，驻在山西大同。是年8月4日，随同阎锡山逃往大连的侍从副官张逢吉（寿阳县人，自幼即充当阎锡山的贴身侍从，为阎的心腹，太原解放前夕，跟着阎锡山逃跑，现在可能仍在台湾），突然来到大同我家中。我知道他来必然有要紧事情，所以立刻引入住室，问其由来。张马上从身上取出一个小红布条，上边有阎锡山的亲笔字，

说即乘飞机回省，要我密接。张逢吉接着和我耳语：“总司令（指阎锡山）明天就坐飞机回来，请司令（指我）务必亲自去接，并且要严守秘密。”我问：“你何不早来两天，我好早作准备。”张答：“这是总司令计划好的日期，早来怕泄露了不好。”第二天，我和张逢吉一起坐上轿车亲到大同飞机场等候（当天我的汽车不在大同），时间很久，飞机才到，降落后，阎锡山身穿绸大衫、头戴草帽，还戴着一副黑色眼镜，俨然一个舞台上的汉奸形象，从飞机上走下来。我立即上前迎接、敬礼，阎微笑和我握手，随即上车，坐在轿车里边，我和张逢吉分坐车前沿左右，遮住阎锡山，以避免人看见。当时，我心里七上八下，忐忑不安，既高兴阎锡山回来，又怕蒋介石、张学良知道后问罪。当晚，阎就住在大同城内户部角新教巷二号我的家中。我把家里人都临时迁到外院，把里院腾出专供阎居住，并严禁家人进入里院。我曾试探着问阎：“蒋先生和张汉卿是不是同意总司令回来？”阎说：“张汉卿自顾不暇，哪顾上管咱们的事，他也管不了咱们。我是不怕他们的，要怕他们还不回来呢！只要你们好好整顿队伍，有了力量，就好办事。事情不能没有（意指蒋、张找麻烦），但他们绝不能把咱怎么样。”言下之意，好像要让我知道有一种“力量”在后边支持他，我自己也从阎锡山坐日本军用飞机回来一事，看出是日本人在做他的“后台”，所以他才有这样不在乎的口气。阎锡山所谓的“张汉卿自顾不暇”一语，是阎锡山当时早已知道日本人要在东北发动侵略战争的证明。

（摘自《山西文史资料》第十一辑）